

# 绿竹神气

彭镇华 江泽慧 著

个男丹子年个日之  
人入子八X个金大  
米力个召正主公  
木米力大士  
马口马本马个个

中国林业出版社



# 绿竹神氣

BAMBOO'S VERVE

彭镇华 江泽慧 著

中国林业出版社

# 绿竹神气

BAMBOO'S VERVE

题 字 彭镇华  
著 者 彭镇华 江泽慧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中国竹文化:绿竹神气/彭镇华 江泽慧著. —北京:中国林业出版社,2005. 10  
ISBN 7-5038-4037-4  
I. 中… II. 彭… III. 竹亚科-文化-研究-中国  
IV. S795-092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6990 号

出 版 中国林业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西城区刘海胡同 7 号  
网络宣传 中艺联盟文化传媒 [lm19.cn/lmii.cn](http://lm19.cn/lmii.cn)  
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
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 
责任编辑 刘先银 江守和 刘国华 何 鹏  
咨询电话 010—66177226  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  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16  
字 数 1200 千字  
印 张 59.75  
彩 插 98 页  
印 数 1~3000 册  
定 价 298 元





彭镇华教授，1964年7月在苏联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大学获生物学副博士学位。

现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、博士生导师。安徽省生态学会理事长，《中国城市林业》、《安徽农业大学学报》主编，《应用生态学报》、《林业科学研究》副主编等。

主要研究方向为林业生态工程、城市森林、土地利用、林木遗传育种等。主持完成长江中下游低丘滩地综合治理与开发研究、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建设研究、上海现代城市森林发展研究等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及各类科研项目30余项。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等。出版专著11部，发表科技论文100余篇。

2001年被授予九五国家重点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，2002年被授予“全国杰出专业人才”称号。2004年被授予“全国十大英才”称号。2005年荣获首届梁希科技一等奖及“全国优秀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



江泽慧教授，现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、博士生导师。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，加拿大Alberta大学法学名誉博士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，中国林学会理事长，中国科协常委、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，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，中国花卉协会会长，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。

主要从事森林利用学、木材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教学、科研工作，林业、科技和教育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以及农业、林业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宏观研究工作。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2项。出版专著10部，发表科技论文80余篇。2001年作为专家领导小组组长主持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，主要研究成果写入《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》。

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2001年被授予“巾帼建功”活动标兵和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称号，2002年获全球环境基金颁发的“全球环境领导奖”。

# 前 言

## P R E F A C E

绿竹从来就是广袤丰饶中华大地上最为常见森林资源，是一类与树木并列庞大家族。“灵根合拱，贞干百寻。振芳條于昆岳，敷绿采于高岭。”

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。有人类就有了历史，就有人与自然，人与社会亲和与抗争，就有人类发展足迹和史料记载，以丰富多采实践活动，构筑灿烂辉煌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长廊。

在东亚大陆优良竹林生态环境条件下，中华古人类依绿竹而居，用竹材为器，取竹笋为食，繁衍生息。绿竹为人类生存提供丰富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所必须生产、生活资源，推进人类体质与智力进化与发展，子子孙孙，“如竹苞矣，如松茂矣”。在中华大地发现众多古人类遗址，如贵州观音洞，福建灵峰洞，重庆市龙骨坡，湖北白龙洞、龙骨洞、石龙头，安徽人字洞、龙潭洞，陕西蓝田、洛南，北京人遗址等，在与人类化石伴生众多动物化石中，就有专门吃竹子与竹笋大熊猫和竹鼠化石，便是佐证。竹器与石器相比，易腐朽，难以长久保存。但是，从出土之石矢可知，北京人早在 30 多万年之前，就发明了竹制弓箭远射复合武器，在远古人类智力开发上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重要工具，成为自然界万物主宰。上古《古歌谣》：“断竹，续竹。飞土，逐宍”。就是颂扬中华先祖伐竹制弓、箭、矛器劳动豪迈场面，以及围猎时尘土飞扬壮观气势，显示古人类睿智明达，质朴无华，以及使用竹制弓箭追杀猎物时威武勇猛、雄伟壮观。竹制弓箭发明，使人类能捕获更多更大型猎物，以满足中华古人类发展对食物需求，从而促进人类本身繁衍壮大，尤其加速其智力开发。又如《诗经》中收录之古歌谣《郑风·箜兮》二章：

箜兮箜兮，风其吹女！

叔兮伯兮，倡，予和女。

箜兮箜兮，风其漂女！

叔兮伯兮，倡，予要女！

“箜”与“箜”，古时通用。改艸为竹，诗境大变。非秋而春，无限生机。

上古男女，何来淫词？劳动欢歌，生儿育女，天经地义。箨箨为远古人类用于制作挡风防雨蔽体，为竹皮冠，笋壳衣、巾、鞋等重要天然原料。《箨兮》是一首远古歌谣，描写黄河中游地区，春天一群天真自由，欢快雀跃青年男女，在竹林中拾箨箨劳动时欢歌快娱。

由竹筒装水与食物蒸煮过程，启迪华夏祖先发明泥土与水与火结合产生化学变化制陶艺术，这又是人类发展史中一件具有划时代重大事件。从此除原始以烧烤成熟食之外，又衍化出以蒸、烹而成熟食，开始以植物性食料为主，食具使用箸（筷子）为特长东方人饮食文化。广西桂林庙岩遗址出土三片陶片，其年龄经测定其年代，距今为 20150~19100 年前，将我国制陶史推进至 2 万年以上，1 万年之前其制陶艺术已十分普及，并于 8000 年前就熟练掌握矿物显色规律彩陶艺术。运用自如地在陶坯绘制烧出理想彩陶。尤以陶工上彩，既准确体现事前设计图案，又要统观全局，下笔精细，由此可推测史前能熟练绘制出旋纹彩陶图案，一定有较高窑变知识和艺术素养。而其绘图工具就是使用竹笔。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之陶器底部印痕均为竹席花纹，说明古人用转轮制陶之转台上垫衬物为竹篾编制，其花纹多达 4~5 种，充分显示距今 7000 多年前黄河中游竹器手工制作已相当发达，且具较高竹编工艺技术。

对于绿竹实物考古发现中年代最为久远者有：距今 7000 年前，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竹子实物；距今 6000~5500 年，湖北枝江县关庙山遗址，（其房屋土筑墙体结构采用层叠条状竹筋加固技术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）；距今 4900~4100 年龙山文化，山东历城遗址出土有竹节炭；距今 3200 年，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，发掘出一件圆锥形小竹篾，做工极为精美。

在中华古文字宝库中，由绿竹所创造竹部文字符号，最早见于远古干栏式竹屋之单扇竹笆门，衍生象形符号“户”字初文“𠂔”；最早刻于龟甲，出现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中，C<sup>14</sup>测定距今 8500 年左右。同一龟甲上还有“目”字，“日”字，如同甲骨文中“户”、“目”“日”，充分表明了汉字起源年代，可能在万年以上。本书中《“个”字探源》是作者一篇独立学术论文。首次论证竹字起源、陶文与甲骨文内在联系及其在汉字体系所起母字重要作用。竹独体字初文“个”，出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陶文中，距今 7800~7550 年；另一同辞同文异体“𠂔”字，象形性更似“灵根合拱，贞千百

寻”绿竹所具之神气，出现于大溪文化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陶文中，距今6000年左右。竹器产生其他象形文字符号，如“𠄎”（贞）、“×”（爻）、“舟”（舟）、“𠄎”（筏）、“冂”（门）等等，均相继出现于距今6000年前各地遗址发掘陶文，充分显示早在6000多年前，东西南北广阔无垠中华大地，已开始形成具有世界独创性、多元一体中华竹文化统一格局。

竹制算筹作为计算工具，为独特风格中华数学体系形成作出过巨大贡献。据史籍载，相传黄帝之臣隸首作算数。汉·徐岳在《数学记遗》：“黄帝为法，数有十等”。《尚书》中《泰誓》、《五子之歌》篇有“億兆”、“億万”、“兆民”等文。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亿、兆等十五个数字记数一整套体系。

竹制古代计算工具，即算筹文字符号“𠄎”（算）初文“×”（筹）或“X”（算），最早出现于西安半坡遗址陶文中，距今6750~6250年，以及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陶文中，距今6600~6400年，当时已使用一、二、七……十进制记数数字文字符号。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（Joseph Needham 1900~1995）在其巨著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：“西方后来的‘印度数字’背后，位制早已在中国存在两千年了。”并评价：“如果没有十进制制，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”。

语言文字发明和书写，是中华文明重要标志。由语言向文字，再由文字向书籍，形成传承人类智慧和知识体系有效途径。古代中外资源不同，其书写材料和方式各异。古埃及人文字写在沙草纸上，苏美尔人文字刻印在泥板上，古印度人文字写在贝棕叶上，柏加曼人文字写在羊皮上。华夏先民发明削竹为简，编简为册，用竹管毛笔点墨书写，使中华古文化形成、传承与发展，应归功于竹简和竹管毛笔之发明与应用。汉·许慎《说文》：“书，箸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箸于竹帛谓之书。……箸于竹帛，非笔末由矣。”《说文》：“篆，引书也。”段注：“引书者，引笔而箸于竹帛也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：“感施多方，其书五车，其道舛驳，其言也不中。”孔子五十读《易》，“韦编三绝。”《墨子》：“书于竹帛，琢于盘盂”或“以为铭于钟鼎，传遗后世子孙”。可见，书于竹帛之书籍，早已形成定制。

据史载，如《左传·昭十二年》：“是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《周礼·春官·外史》：“三皇五帝之书”典、谟之类，为传说中我国最古书籍。《三



坟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为上古之竹书，《五典》，即指“少昊、颛顼（高阳）、高辛、尧、舜”时代竹书。现今所见传世典籍、古书如：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水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汉记》、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、《范胜之书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新语》、《盐铁论》、《法言》、《论衡》，……等等先秦至汉初经典，包括儒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天文算法术数、古典文学、谱录、杂农、类书，小说家、释家、道家等众多部类。汉·刘歆（～公元23年）受命负责统计和整理当时皇家藏书，共计39090册。书籍均写在竹简，也是我国图书史上首次有关皇家藏书数量明确记载。

造纸术发明后，竹纸等纸类以其更简便、容量大，替代竹简继而成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载体。在发明竹帘抄捞纸浆制纸器具基础上，才实现以竹转为竹纸，进而产生质上根本变化。公元6世纪，我国发明造纸术传往邻国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；12世纪传入欧洲，18世纪已传往世界各地。在造纸术未传入欧洲之前，欧洲人用羊皮和埃及莎草纸做书写材料，抄写一本《圣经》，至少需用三百多张羊皮。中国造纸术之发明对推动世界文化发展产生无可估量巨大作用。

竹管毛笔发明与应用，对独具世界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具有重要作用。用毛笔蘸墨或朱砂在陶器或竹片等材料上书写文字或绘画，起源古老。应用毛笔绘制陶器，最早出现于距今7000~6500年仰韶早期彩陶标志性鱼纹纹饰。又如距今4500年，甘肃马家窑文化半山遗址出土陶器上，彩绘连续旋纹，以流畅线条，绘出动感强烈，似黄河波涛。用毛笔书写文字，最早见于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之陶文，距今6750~6250年；朱书陶文，最早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宁阳堡头遗址出土之陶器上，以及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陶扁壶上（其年代约距今4500年），“𠄎”（文）字符号，笔画清晰流畅，色泽匀润，为毛笔类书写工具所为。

书法是专指用竹管毛笔写字艺术。是中国独具特色传统艺术，深刻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、民族气节和审美情趣。以其独特艺术形式和艺术魅力，成为华夏传统文化之国粹瑰宝，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璀璨明珠一朵

奇葩。

绿竹是自然之物，更是自然中特殊植物群落。非草非木，小异空实，一同节目。挺拔玉立，体圆条畅。坚节韧竿，刚柔兼备。青翠纷披，气清韵雅。凌云傲霜雪，不改柯易叶。在竹林中，中华古人类与之朝夕相处，共同厮守多少万年之久历史长河中，绿竹不仅给予人类予求予取，环视竹林之中，翠竹林立，竹长鞭、鞭生芽、芽孕笋，雷震笋迸，抽生成竹，竹又长鞭孕笋，地上群竹千万个，地下竹鞭，鞭连着鞭，子子孙孙，宗生族茂，布满山川。人竹共生，竹赋人情，人寓竹名，竹化为人，人化为竹，交乳交融，和谐融贯为整体。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—，—体具化，布满大千，精神融入竹林，使绿竹人格化；而绿竹又净化心灵，进而人格化为“君子”象征。绿竹之独立、坚韧、包容、固守、虚心、谦和、团结协作等人文精神，正是在人与绿竹之情感互动中孕育升华，极大地推进中华民族哲学、文学、美学艺术精神之产生与发展，形成中华民族所特有浩然神气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在社会变革浪潮冲击下，诸子百家文人名士得以不断涌现，摆脱宗法等级制度束缚。在获得较多人身自由同时，冲破思想樊笼，提出诸多政治主张、治国方略与新思潮，出现了道、儒、墨、法、阴阳、名、兵等众多思想流派，各立新说。如《接舆歌》：“凤兮、凤兮，何如德之衰也。来世不可待，往世不可追也。天下有道，圣人成焉。天下无道，圣人生焉。方今之时，仅免刑焉。福轻乎羽，莫之知载，莫之知避。己乎己乎，临人以德。殆乎殆乎，画地而趋。迷阳迷阳，无伤吾行。吾行却曲，无伤吾足”。春秋时楚国隐士陆通，佯狂避世，孔子适楚，逆于车前，放言狂歌，故称“接舆歌”。甚至楚王往聘，隐去不出。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，涌现一批杰出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和教育家，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。

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以竹自况特殊知识群体，如魏晋“竹林七贤”、唐代“竹溪六逸”、宋朝“苏门六君”以及清时“扬州八怪”。其中佼佼者有嵇康、李白、苏轼、郑燮，不仅贡献巨大，且体现绿竹风范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在江苏南京市西善桥、胡桥等地先后发掘出四座南朝宋、齐皇陵中，发现几套精美绝伦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》墓室砖印壁画。画上人物意态，服饰及构图，笔法如出一辙。画面上有双干阔叶瑞竹、青松相间，在竹树下有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七贤之外，还有一位晋人

喜爱称春秋高士荣启期。史载东晋·顾恺之、史道硕，南朝齐·陆探微、毛惠远，南朝宋·宗炳等名画家所画《竹林七贤图》与此画也源出一本，甚至北朝境内山阳七贤祠内和北朝士族大家墓葬中均有《竹林七贤图》。足见，当时对竹林七贤人物仰慕之极，缅怀致深。关于《竹林七贤》事迹记载，最早始见于东晋·孙盛著之《魏氏春秋》，陈寿(公元233~297年)《三国志·王粲传》附《嵇康传》，东晋·戴逵《竹林七贤论》，以及南朝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。

“竹林七贤”以共同追求，而游志于竹林，以竹自况结成一个以嵇康、阮籍为首名士群体。正始四年(公元243年)游会于山阳嵇康宅园竹林。嵇康为竹林之游倡导者，共同追求人性自由以及人生主张形成竹林玄学。竹林玄学又成就七贤之风度与气节，也成为七贤标识。

嵇康《述志诗》：“岩穴多隐逸，轻举求吾师。”阮籍《咏怀诗》：“幽兰不可佩，朱草为谁荣。修竹隐山阴，射干临增城。”后来，嵇康坚持自己志向，不从俗流，隐居竹林。由于人格魅力感召，向秀、吕安、郭遐周、赵辽叔、赵至等纷纷追随嵇康至山阳。

嵇康在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把“君世”之尧舜、“佐汉”之子房与避世放歌之巢由、接舆都视为君子。竹林七贤游于竹林之中，想远离政治，躲避黑暗政治迫害。但最终谁也很难以真正置身于政治世俗之外，谁也没有脱离强烈社会参与之冲动。竹林之游显示七贤用老庄哲学对社会非正义行为批判，崇尚人性自然，是遵循道儒并兼宗旨，再次证明了中国古代文人名士强烈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，以及为中华民族建功立业之远大抱负。

公元264年，嵇康为司马氏野蛮政权所杀，年仅39岁。以其高风亮节人格，绝世风度，迸发出最后夺目光辉，活得潇洒，死亦潇洒，神色自若，顾视日影，索琴而弹，不悲生命之逝，反叹《广陵散》从此而绝。三千太学生求赦为师，此种悲壮诀别，写尽人生风流。实现“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。”“气可爆，节犹存”献身精神。

公元317年，晋室东渡，文士与大夫们大量南逃，江南广袤茂密竹林，成其托身、浪迹、隐居所在，更令风流名士所痴迷沉醉。一时间，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姓名者有之。永嘉名士张廌家有竹林数十顷亩，于竹林中筑舍，常居其中，隐逸颐志，自号竹林居士。王羲之得知去造访，张廌却避竹林深处而不见。王羲之在绍兴筑兰亭，借修竹茂林，筑曲水流觞，引清流激湍，

饮酒作诗酣歌。王子猷暂寄人空宅，便令种竹，对竹啸咏良久，指竹曰：“何可一日无此君也？”

汉唐盛世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之鼎盛时期，绿竹浩然之气，在唐朝野士大夫中继续汹涌奔腾。唐太宗李世民在《赋得临池竹》啸咏竹有坚贞之节，人应如何感叹！王勃诗句：“野客思茅宇，山人爱竹林。琴尊佳待处，风月自相寻。”陈子昂诗有：“春木有荣歇，此节无凋零。”卢纶则云：“圆月出山头，七贤林下游。”当时，李白亦有众多诗文流露对竹林七贤深致缅怀和向往：如“访戴昔未偶，寻嵇此相得”、“何时竹林下，更与步兵邻”、“复如竹林下，而陪芳宴初”、“恭陪竹林宴，留醉与陶公”、“今日竹林宴，我家贤侍郎”、“竹林七贤去道赊，兰亭雄笔安足夸”等诗句。向往“竹林七贤”，其后李白从安陆移家东鲁，与孔巢父、韩准、裴政、张叔明、陶沔等隐于徂徕山西北嶓石峰下竹溪，声名远扬，时人号为《竹溪六逸》。

唐代隐逸风尚遍及朝野，以至在朝显贵中亦有人对隐逸有着深情向往，“朝携兰省步，夕退竹林期。”当时文人与士大夫多有隐逸行迹。或学业、习道于竹林，或隐居待时，或愤世归隐，或时隐时显，或亦官亦隐，不一而论。唐代皇帝为巩固和稳定统一政治局面，每每征召，旌扬隐士以表乐善求贤。唐继隋开创科举，经层层考试择优选仕外，在承上古求贤传统，并加以发展为明正言顺开制举之科，求贤搜隐并加以礼敬，使仕隐兼通成为盛唐选仕主流。唐代大部分时期多继承以儒为主“三教圆融”主张，以儒治世，以佛治心，以道治身，兼容三教，交互为用。诏令王公百官习老子《道德经》，又诏令天下每户有一本，设“道举科”，专考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等，在其他诸科中加重考试分量，等等。开放思想氛围为唐代隐逸士人，提供顺理成章理论依据与方向，加之经济发达，山庄园林式别业遍布，寺庙道观大为发展，庶族士子选择山林学业、习道，既有食宿之便，又有丰富藏书，还可向隐士和高僧请教，更不是以前《梁书·阮孝绪传》中所说隐士“所居室唯有一鹿床，竹树环绕”竹床、竹椅艰苦环境，实为贫寒士子提供求学良好环境。

因此，唐代许多文人从青少年起，纷纷遁迹于山林中习业、学道，并信奉出仕前应先经历自我修养、陶冶情操。仕前隐逸为修身养德，饱学道义，然后揭修道去行道，干谒王公，遂成当时文士心中自然历程。读书山林，以习举业，“林栖谷隐，栉比鳞差”，可知竹林幽静习业之盛况，乃成一代风气。如

孟浩然、王昌龄、高适、王维、岑参、钱起、房琯、吕向、卢鸿、崔署、刘长卿、李嘉祐、卢纶……等等，均有读书于精舍经历。唐代科举在高宗咸亨以后，进士科尤重视诗赋，因而诗赋习作，遂成为入仕要领，期间以李白尤为突出。李白家世难明，生地未定。据太白自述系出凉昭王九世孙，隋末先世以事徙西域，隐易姓名；唐兴以来，漏于户籍。至武后时，子孙始还，至于蜀绵州家。李白之父因通其邑，遂以客为名，后以为蜀人。故里为唐代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，相传李白旧宅在今四川江油县境内。李白自幼天资聪颖，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。轩辕以来，颇得闻矣。”“十五观奇书，作赋凌相如”、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”、“十五游神仙，仙游未曾歇”，少作甚多。十八岁，读书匡山大明寺。蜀中秀丽山水引起他对自然无限向往，漫游蜀中，与道士隐者交往，过隐居习业、学道生活，对其影响最深当数赵蕤和道士元丹丘。赵蕤博学韞铃，长于经世，夫妇俱有隐操，开元中召之不赴。元丹丘为盛唐著名道士，李白与其交往尤深。生于北陲少数民族地区，加之蜀中山水秀色与竹林景观以及赵蕤之任侠、元丹丘之好道，铸冶青年李白心灵，构成豪放自由性格。《访戴天山道士不遇》：“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露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野竹分青霭，飞泉挂碧峰。无人知所去，愁倚两三松。”又《酬宇文少府见赠桃竹书筒》：“桃竹书筒绮绣文，良工巧妙称绝群。灵心圆缺三江月，彩质叠成五色云。中藏宝诀峨眉去，千里提携长忆君。”李白二十岁（公元720年）出游巴蜀，干谒求荐活动失败，返昌明匡山，归来时作《冬日归旧山》：“未染洗尘缨，归来芳草坪。一条藤径绿，万点雪峰晴。……嫩篁侵舍密，古树倒江横。……洗砚修良策，敲松拟索贞。此时重一去，去合到三清。”以山中嫩篁、乔松自励，潜心习业，陶冶性灵，以图进取。以“三清”喻朝廷、帝京。隐有常欲“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”壮志。又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说：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”、“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，事君道成，荣亲义毕，然后与陶朱，留侯浮五湖，戏沧州，不足为难矣。”足见，李白青少年时已形成“济苍生”、“安社稷”远大理想与宏伟抱负，以期以布衣直抵卿相，匡君济世，功成身退。

开元十二年（公元724年）春，李白二十四岁，怀着鹏博万里壮志去蜀远游。临行有《别匡山》一诗，此后，李白从未返里，飘出云峡，开始以艰难曲折之漫漫人生。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可知，出川第一目的是“事君”、

“荣亲”，其次才是“浮五湖，戏沧州。”为自己规划“功成身退”人生道路。至于李白，由科举入仕之途尤为艰难，几乎无望。《唐六典》明文规定工商之家不得入仕，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甚至将工商子弟称为“异类”，且以之与“刑家之子”相提并论。唐代无论考常科，或是制举科，举子必须填写籍贯及三代人名讳，都应向礼部递交。李白竟连自家三代及自己出身也说不清，道不明，既无谱牒与户籍可查证，更无显臣出来作保。李白从十五至二十岁在川内，又从二十岁奔波至四十岁，游遍大唐江山东西南北“遍干诸侯，历抵卿相”。低就入婿前宰相许府，东闯西撞，无非为找得力“保荐人”，可李白家世与出身，谁能作保？！

李白融合道儒思想，历经二十多年漫游和隐逸，西起峨眉，东至天台，北抵五台山，南达苍梧，游访天下名山大川，名胜古迹，频交士人与道士，“干谒王公大臣”，以自己卓绝才思和豪迈奔放诗歌，名声逐渐远播。天宝元年（公元742年），李白四十二岁时，由玉真公主推荐，八月玄宗诏下。李白接诏后，极为兴奋，临行高歌：“游说万乘苦不早，著鞭跨马涉远道。……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遂自东鲁南陵田舍启程赴西京长安，至京师，遇太子宾客贺知章。知章称李白为“奇白风骨，呼为谪仙子”，使李白名彻长安，又荐于玄宗。宋中丞若思让其以采访使名义起草荐表，自当堂而皇之。玄宗召见于金銮殿，降辇步迎，亲手调羹，优礼有加，命待诏翰林院。玄宗厚遇，知章揄扬，以及李白本人诗名，一时倾动皇城内外。

然而，李白并未被授以正式官职，只是个御用文人，点缀升平，歌功颂德，陪玄宗游乐作词而已。耳濡目染“君王虽爱娥眉好，无奈宫中妒杀人”。昔日励精图治唐玄宗早已在歌舞宴乐中消磨锐气，令李白无奈，大失所望，有志难展。具有刚韧相济李白，常出宫痛饮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软抗动摇皇帝宠幸；以“谗浪赤墀青琐贤”傲岸，又触怒权贵，遭谗害。天宝三载（公元745年），李白四十五岁，上疏求去，玄宗正恐其“言温室树”，遂命“赐金还山”。

三年宫廷生活，反而磨就李白一身骨气，同时也激发满腔悲愤。李白待诏翰林院期间确实屡有“言温室树”之作，如《乌栖曲》、《周穆八荒意》、《上元夫人》、《寓言三首》、《古风·齐瑟弹东吟》，其中不无援古讽今，正体现诗人高度睿智与敏锐洞察力，成了千秋殷鉴。



“一朝离京，十载客梁园”，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出”李白怀有此种心境，唱“行路难”，重新开始人生慢游，时而以寄君国之思，时而抒愤懑之情，可见其“裂竹见直纹，剖竹见贞心。”尤其幽州危机，令其坐卧不安，入幽州探虎穴，三上长安，献策无门，“晋风日已颓，穷途方恸哭”。比言“晋风”，实指唐风。不因献策无门有祸，改寄望于老将军哥舒，《述德陈情上哥舒大夫》。李白三人长安之行，最后以《远别离》：“……帝子泣兮绿云间，随风波兮去无还。恸哭兮远望，见苍梧之深山。苍梧山崩湘水绝，竹上之泪乃可灭。”、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，当时盛唐已如大厦将倾，祸在眉睫，而李白报国有心，回天无术，一腔孤忠，满怀幽愤。

李白有国难投，有家难归。天宝十二载（公元753年）秋，南下遁迹于皖南山水。后传安禄山密使何昌浩又追到皖南贵池秋浦，强欲邀之北去。李白坚拒，以《山鹧鸪词》作答：“苦竹岭头秋月辉，苦竹南枝鹧鸪飞。嫁得燕山胡雁媚，欲衔我向雁门归。山鸡翟雉来相劝，南禽多被北禽欺。紫塞严霜如剑戟，苍梧欲巢难背违。我心誓死不能去，哀鸣惊叫泪沾衣。”

李白以苦竹况比人生，苦竹虽小，但能仗节自守。注重气节是华夏古代文人士大夫传统。“气”是“浩然之气”；“节”是一种人格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节，竹约也”。段注“约，缠束也。竹节如缠束之状”。“节”字从竹，本义是“竹节”，伸引为“节义”、“节气”以后又有“节操”、“晚节”、“守节”等对人评价。合而言之，气节就是指做人应有高尚道德情操，不取媚于皇威权贵，处危难刚直不阿。又以鹧鸪自喻，自呼其名，向日而飞，决不飞离生我养我之祖国。“苦竹寒声动秋月，独宿空帘归梦长。”李白一生坎坷，经历唐朝由盛到衰转折，满怀一颗报国赤心，却屡遭不幸，甚至被牵连获罪，流放远方。高节依在，悲伤已极，终不改初衷骨气犹存。“乍向草中耿介死，不求黄金笼下生”，侠骨、醉骨、仙骨、傲骨，成其人格风度。李白传世诗歌1500多首，其中不少诗句，家喻户晓，朗朗上口。豪迈雄壮，博大瑰奇，充满灵气，堪称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浪漫诗人，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朽丰碑。韩愈赞颂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。

中国画竹艺术特点是源于自然，人与自然高度契合，特强调画家个人修养和对人生与自然感悟。因此，源于自然，出自胸臆，书画同源，诗画一律，书、画、诗三艺于一体，画尽意在，从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画坛美苑中一枝独

特奇葩。

绿竹具有独特自然特征和自然审美品质,最早与人类结下不解情缘。从古人以依竹乃至爱竹,到周穆王“于玄池树竹,名曰竹林。”环宅种得,伴竹而居,而后画竹悬于室内,进而与竹相伴。绿竹与历史和民族结下不解之缘,凝聚和流荡中华民族气质及审美意识,奠定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基石。“古者造书契、代结绳、初假达意,浸乎竞美。”远古贤者创造“竹”字符号正是从用竹、爱竹、赏竹、种竹、咏竹、写竹、画竹过程中,高度概括竹之形、竹之用、竹之质、竹之意、人之情,而最后提炼出其架构最为简洁、线条最为明晰,且又蕴含极其深厚社会理念视觉艺术形象——“竹”字。如表征为立于天地宇宙间两竿修竹,又暗喻居位于竹林下竹棚里两个人。正如晋·江道《竹赋》:“有嘉生之美竹,挺纯姿于自然,含虚中以象道,体圆质以仪天。”以“绿竹”为楷模,自然之竹到胸有成竹,又到胸无成竹,意在笔先,画尽意犹在,使写竹意境升华至更高精神境界。可见,绘画与汉字具有割不断亲缘关系,是汉文化独特产物。正如古人所说:“书画同源”、“书画同法”、“书画异名而同体”等名言。画竹,古时称为“写竹”。一个长期使用标音字母并对汉字修养有限境外人士美国诗人、文艺评论家埃兹拉·庞德(Ezra Pound 1885~1972)在《论中国书面文字》一书:“每个中国人在纸上写字,实质都是组合图画,如‘東’字,即体现太阳从树梢中悄然升起。”可见对汉字架构间蕴含各种不同意象真切感受,足以反证汉字视觉效应独特魅力。

写竹之源,可上溯原始社会,人类社会由渔猎采集时代进入到原始农业、手工业时代。砚是绘画和书写重要工具,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发掘出土,距今6000多年162号女性墓葬中,出土一方石砚,前有贮水池,后有研墨池,其造型、结构和现代砚已无二致,为绘画和书写提供重要工具。1954年在西安半坡村发掘出土,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遗址,其中出土彩陶上有“竹”字符号。而后70年代在陕西咸阳发掘秦都咸阳市第3宫殿遗址时,在出土宫廷壁画废块中发现有幅写竹图,竹叶墨较淡薄,呈披针形,类似现今紫竹。今存于西安碑林中汉代竹叶碑,据清人褚峻、牛运震所撰《金石经眼录》:“观其碑形隶法,足知其为汉矣。……碑两面隐隐有竹叶文,或谓之竹叶碑云。”清·彭蕴璨《历代画史传》引关羽故里《解州县志》:“画竹始于汉寿亭侯。”今存有关羽画竹诗与石刻画竹,凛凛刚正。



唐代写竹在各种画论典籍均有记载与论述。唐代诗人、画论家张彦远(公元841~846年时在世)“窃好斯艺,寻其踪迹,不见者不录,见者必书”所著《唐朝名画录》,共收录唐初以来二百年间画家126人,对其亲见并有作品者97人,依神品、妙品、能品、逸品等进行品评。由此反映唐代画竹艺术兴盛,画家都精于画竹。尤以在萧悦名下专列竹一科,再分列竹鸡、鹤竹、花竹、竹木、竹树、竹石、雀竹等类。作品内容丰富,命题广,显示竹林生物多样性。画家萧悦善画竹,亦甚自秘重,甚至有终岁求其一竿一枝而不得者。有天忽写十五竿,送予白居易。白居易随即题《画竹歌》并引予以答赐,诗人高度审美灵感,26行诗句186字评画论艺,诗意生动贴切,高度赞扬萧悦写竹“独逼真”,用笔清瘦劲健,丹青以来第一人。“茎瘦节节竦”,“枝活叶叶动”,“不根而生从意生,不笋而成由笔成。”“婵娟不失筠粉态,萧飒尽得风烟情。举头忽看不似画,低耳静听疑有声。”正是萧悦写竹高超技艺,无限生意。萧悦写竹传世作品有多幅为宋代御府所藏。元代画家李衍在《竹谱详录》:“又得萧协律《竹笋图》,绢素糜溃,笔踪惨淡。”同时期,唐代另一位画家程修己( ~公元863年)在文思殿画竹幃数十幅,唐文宗李昂(公元809~840年)题诗:“良工选精思,巧极似有神。临窗时乍睹,繁阴合再明。”

安史之乱,唐后期便一蹶不振。然而写竹艺术依然乘竹文化潮流滚滚涌动。相继涌现如于邵、周昉、孙位、刁光胤、张立、僧梦休、周滉、方著作等画家都是写竹能手。唐代画家写竹遗迹传于后代,据《宣和画谱》宋徽宗朝御府收藏有:张璪《松竹高僧图》;韦鉴《竹林七贤图》;萧悦《鸟节照碧图》、《梅竹鹑鹈图》、《笋竹图》、《风竹图》;边鸾《竹禽石图》;刁光胤《竹石戏猫图》、《猫竹图》;周滉《秋景竹石图》;孙位《墨竹》。《画继》载录范荣公孙淑忠甫家收藏有王维画《雪竹图》;邵太史博公济家收藏有孙位画《松竹壁》。宋代画家、书法家米芾在《画史》记述:见“王巩,字定国,收唐人竹图,著色亦好,一横竹比他竹大粗也”。“余以范宽图易梦休《雪竹》一幅,巨石倒影,下落叶数片浮于水上,旁有枯木亦倒影。”、“今蔡胜道有梦休用六幅绢画《雪竹图》,长丈余,奇甚,大屋梁方可悬挂,森森如坐竹下。”梦休,唐末高僧,僖宗时(874~888)蜀人,画竹疏放,有《雪竹图》、《雪竹双禽图》、《风竹图》、《笋竹图》、《丛竹图》传于后代。《广画集》载孙位《松石墨竹》,及成都大慈寺灌顶院有张立墨竹画壁。可见,唐人写竹无论是壁画,还是绢本画,均为大手笔,